

大批判材料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第13期

(总第26期)

中共苏州市委大批判组编

1977年8月16日

“四人帮”极右路线的一条支脉

——评“某师傅路线”

居鸿琪

“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拼凑了一个什么“张春桥思想”，还鼓吹有一条什么“姚文元道路”。“四人帮”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也亦步亦趋，宣称有一条什么“某师傅路线”，并把它吹成是“一贯正确的路线”，扬言“谁反对谁倒霉，谁搞我谁垮台”，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

唯此人有此线

要知道“某师傅路线”是什么东西，先要对某“师傅”其人考查一番。正如被“四人帮”封为“两省总督”的河南某师傅和他们宠爱倍至的湖南某“师傅”一样，长期盘踞苏州、绰号“某老虎”的某“师傅”，也曾被“四人帮”以及他的帮兄弟们吹得神乎其神，说他是什么“老造反”、“大左派”，把一顶顶“红得发紫的桂冠”往他头上套，把一个个响得刺耳的美名往他身上加。他自己更是恬不知耻，拚命地往脸上涂脂抹粉。然而，不管某“师傅”如何乔装打扮，也掩盖不住他那极右派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曾经指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造反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我们所讲的造反，是指的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敢于造剥削阶级的反。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造“三座大山”的反，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用这个尺度来衡量，那个某“师傅”连“造反”二字的边也没有沾到。解放前，他长期受剥削阶级思想的熏染，先后参加过反动的一贯道和黄色工会，社会关系也很复杂。解放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未得到改造，醉心于名利地位。有一年厂里评先进，群众不评他，他就大吵大闹，要挟领导把别人拉下，把他补上。还有一次厂里评困难补助，没有被评上，他大为恼火，一气之下，甩掉了申请补助单。他还经常边喝闷酒，边发牢骚：“什么模范，这辈子算了。”还发誓赌咒：“喝酒、抽烟，一直要到上铁板（火葬）。”请看这就是“四人帮”封为“大左派”、“老造反”的某“师傅”的真面目。

这样一个连一点造反气味都没有的人，却怎么戴起了“老造反”的桂冠呢？列宁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

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某“师傅”正是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混进革命队伍的冒险家和骗子。他曾经欺骗别人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又“以最快的速度刹住了经济主义妖风”。其实，只要稍微翻一下他的所谓“造反”小史，这种欺世盗名的西洋镜就戳穿了。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某“师傅”却躲在一旁，怕得要命，连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别人要他站出来造反时，他却叫嚷：“他妈的，你们是要把我推上第一线当炮灰，是要送我的命。”至于说他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事，就更是捏造事实，沽名钓誉。实际上，当时他竭力主张发一种不合理的费用，并说：“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是对的”。后来，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果断的革命行动，刹住了经济主义妖风，当时他根本不在苏州。然而，他却捞取政治资本，屁股一转，由顺风派冒充顶风派，贪天之功为己功。

某“师傅”造反是假的，而一度“发迹”却是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所在的工厂有一个野心勃勃、惯于结帮拉派的人物，一向主张：“流氓也要有一批打手，叫化子也要有几个朋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人就把某“师傅”作为自己的“打手”和“朋友”，以适应某种政治需要。经过这个人的一番策划，把他捧上了厂文革主任的位子。某“师傅”先是感到太危险，发牢骚不愿干，后又觉得有利可图，就拚命投机钻营。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市时，他以为混水摸鱼的时机到了，就暗地里同后来在团省委里紧跟“四人帮”的那个人搞了一笔政治交易，拉了一个山头，在“一月风暴”中，窃取了全市革命人民的斗争成果，混进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从此，他带着他的帮兄弟，终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做了小官要当大官，当了副职要当正职，风头越出越足，利欲越来越大，官瘾越来越高。

这就可以看清，某“师傅”那里是什么老造反，只不过是政治扒手而已。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野心勃勃，大施阴谋，投靠林彪和“四人帮”，在苏州建立黑基地。他制造分裂，挑动武斗，结帮拉派，打倒一切，祸国殃民，干尽了坏事，充当了“四人帮”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他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年九月九日，他多次拒绝接省委负责同志传达中央有关毛主席逝世通知的电话，却躲在办公室里召集一帮人开黑会，搞阴谋活动。在苏州市十万军民沉痛举行追悼大会时，有关筹备工作，他不仅不参加，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干扰破坏，并攻击这样的大会是为了“登报”、“出风头”，真是恶毒之极。他极其仇视周总理，在向“四人帮”送的黑报告中把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污蔑为“反革命逆流”，把人民群众写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标语，统统诬之为“反动大标语”，把同意写这些标语的革命领导干部说成是“带头发难的指挥者”。去年一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某“师傅”连连叫嚷：“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把华国锋同志关于“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的指示，诬蔑为“走资派的护官符”。如此等等，都充分暴露了某“师傅”从来就没有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而是走在“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道路上；他的立场从来就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而是站在新老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的一边。他的所言所行哪里有一点左派的气味，而分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极右派。

其人极右派，其路线也就可想而知了。

剥去画皮看黑线

“四人帮”在苏州的那个代理人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一向吹嘘自己是九、

十次路线斗争的“英雄”。他的帮兄弟们也一吹再吹，左捧右抬，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帮派头目叫嚣：“有人说‘某师傅路线’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不能这样讲，路线正确为什么不能这样提。”在另一个场合，又一个帮派头目喊叫：“‘某师傅路线’就是高。”可是，“某师傅路线”究竟是什么东西，说穿了就是“三搞一篡”，梦想建立法西斯帮天下。

所谓“某师傅路线”，就是鼓吹改朝换代，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就竭力歪曲这场政治大革命的性质，说什么“改朝换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以煽动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造无产阶级的反。某“师傅”和他的帮兄弟们则叫喊“历史把我们推上领导岗位”，“我不掌权谁掌权”，似乎应该由他们来主宰天下了。正是出于这样的野心，某“师傅”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某“师傅”深知革命老干部是他们改朝换代建立帮天下的主要障碍，必欲“打倒一切”而后快。他们先是把革命领导干部扣上种种罪名，能打倒的打倒，打不倒的打跑，打不跑的搞臭，搞不臭的搞病，搞不病的让他靠边站。后来又恶意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颠倒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关系，他们捏造了一个反动公式：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等于反革命。嚎叫：对老干部“有的要打针，有的要开刀，有的要刮骨疗毒”！咬牙切齿之声，隐隐可闻。市委一个老干部年老有病，眼睛充血。他们就诬蔑这个干部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眼睛“瞪着造反派”瞪得“血红”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便是有。他们曾准备了氧气瓶，要把那位眼睛充血的老干部从病床上拖出来整他斗他。某“师傅”对顶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干部是恨的，对新干部也要看是否顺着他们，是否有碍于他们篡权。不顺着他们，而有碍于他们篡权，即使新的也在打击之列。反正“帽子工厂”里备货充足，品种齐全。要给你扣上几顶什么帽子，俯拾皆是，随拿随扣，而且拿之不竭，扣之不尽。

某“师傅”打倒一切，正是为了取而代之，独吞印把子。在“一月风暴”中，他窃取了全市革命人民的斗争成果，一时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一九六八年春天，苏州市实行革命大联合，市革委会进行了充实调整，某“师傅”的职务由主任调整为副主任，他顿时觉得官阶低了，桃子小了，便大发牢骚：“怎么大联合，罢了我的官，撤了我的职！”活现出一副权欲熏心的丑相。批林批孔开始时，他在王洪文的黑保护伞下，一方面竭力掩盖和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关系，一方面大搞阴谋诡计，篡夺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抢到了主持市委工作的位子。本来，那时他是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省委要他到南京去任职，他竟以“没有实权”而抗命，贪婪地说：“造反造到今天，弄了个‘苏空头’”，“乌纱帽没有捞到，捞到个柳条帽，没有意思，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乃是篡夺省委的领导权。他依仗“四人帮”的权势向省委负责同志施加压力，气势汹汹地声称：“我要从苏州带一帮人来，造你的反”，并官瘾难耐地说什么：“现在这种时候，我不出面是不行了。”拉出了“当今之世，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臭架势。到了一九七六年，他伙同“四人帮”在省委内的那个代理人以及紧跟“四人帮”的一两个人，疯狂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另搞一套，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抓“走资派”。他们玩弄“以苏治苏”的阴谋，推行“上压下挤、内外配合、南北夹攻、统一行动”的反革命方针，要把各个帮派集团的势力统一在“四人帮”的黑旨意下，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火烧到南京去，烧到省委去”。他还同另一个代理人 and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多次策划，阴谋改组省委领导班子，并具体策划了进省委常委的人选。他们蓄意挑起事端，捏造罪名，栽赃陷害，让“四人帮”向中央政治局施加压力，阴谋逼中央表态，发一个“几号文件”，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换掉，以达到其“改朝换代”的罪恶目

的，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所谓“某师傅路线”，就是大肆结帮拉派，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疯狂叫嚣党要“改造”、“重建”，阴谋以帮代党。某“师傅”和他的帮兄弟也叫嚷“我们也要拉一个帮”，要从组织上“动大手术”。于是他们利用窃取的大权，拼凑帮班子，组织自己的人马，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某“师傅”在他的帮派体系中，建立了一个指挥部和四大系统：一个政治流氓控制了指挥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打手和前台总指挥；一个善于伪装，搞两面派的帮头目控制了组织系统，掌管提拔干部、调整领导班子的组织大权；一个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控制了情报系统，专门刺探情报，搜集黑材料，大搞特务活动；一个反动文痞控制了舆论系统，专门写反党文章、诬告信，大造反革命舆论；还有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控制了全市的“第二武装”系统，以维护他们帮天下的统治。他们以是否忠于“某师傅路线”来划线，网罗党羽，壮大帮势。凡是拥护“某师傅路线”，肯为他们一伙卖命的，不管什么人，都赠与“官帽”，给与“党票”，赋与特权，赏于高位，就连杀人放火者、贪污盗窃者也可以逍遥法外，甚至照样升官发财。他们在上海余党那里取来黑经，召开所谓“组工会议”，恣意践踏党规党法，公然篡改党员标准和接班人五项条件，大搞“突击纳新”、“突击提干”，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和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当作商品和资本，用以收买亲信。

仅一九七五年三月至八月，他们在“突击纳新”的同时，就对二十二个区、局、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动了“手术”，派遣他们的帮兄弟控制这些区、局和单位的领导权。

某“师傅”通过“双突”招降纳叛，把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流氓阿飞、社会渣滓拉入党内，塞进各级领导班子，组成一支推行“某师傅路线”、篡党夺权的别动队。他们以帮压党，以帮代党，严重损害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了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败坏了党的优良作风，篡改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以“一帮化”对抗党的一元化领导，心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党委，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踩在脚下，把帮的利益当作最高利益，把帮头的话当作“最高指示”。在市里，他们把帮的核心人员置于市委之上，全市的大事都要先在帮内策划，然后再拿到常委中去强行通过。如果遭到反对，他们就在会上发难，搞突然袭击；会后又组织帮兄弟围攻，闹得常委诚惶诚恐。对基层，他们更是以帮的控制，取代党的领导。就以某“师傅”及其主要帮头目“发迹”的那个工厂来说，党委领导大权就曾落在当年的武斗总指挥手里，此人秉承某“师傅”的黑旨意，在厂内大搞“双突”，培植亲信；依仗帮势，包庇坏人；排斥异己，镇压群众。弄得好人受气，坏人得势，把工厂糟踏得不成样子。从这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那个代理人结帮拉派，对党的肌体的腐蚀和破坏是何等的严重啊！

所谓“某师傅路线”，就是对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妄图篡改人民武装的性质。“四人帮”是一伙法西斯黑帮，他们曾经杀气腾腾地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还建立“第二武装”，动用民兵镇压人民群众。某“师傅”长期盘踞苏州，横行霸道，其种种倒行逆施，正是“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的一个缩影。

某“师傅”曾恶狠狠地说，“谁反对我谁倒霉”。他从“钢铁公司”老板“四人帮”那里贩来大批“铁棍子”，谁给他提意见，就铁棍子打去，说什么“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或被骂作“反动儒生”、“复辟势力”，甚至遭到勒令检查、围攻揪斗。那个某“师傅”还只准他们大写特写反动的大字报，而不准革命群众贴他的大字报。凡有贴他的大字报的，他就派人去摸人家的底，看档案，抓辫子，还要查

后台，排队列出支持者、同情者、倾向者，以便论罪算帐。对于反他的大字报，写者固不轻饶，看者也不放过。他的办法是利用各种渠道办“学习班”，“洗脑”、“消毒”，看者都要谈出看大字报时的“想法”，并表明现在的“认识”。在他们的控制下，真是：写革命大字报有罪，看革命大字报倒霉！更是甚者，有个工厂的干部群众提意见反对那个代理人推行的极右路线，触犯了他们的“虎威”，他就派一个心腹到厂把科室车间中层以上干部拉出厂外，前后办了两期所谓学习班，花了两个月时间强行统一对“某师傅路线”的认识，大多数同志反对这种作法，那个代理人又亲自出场横加打击报复，把大批中层干部调走，还打算让一些厂党委负责同志提前退休，把他们打发回家。正因这样，弄得一些人提心吊胆，谨小慎微，“逢人莫谈苏州事，出门不找老相识”。某“师傅”一伙压制人民群众达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发指！

本来，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的后备力量，是加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而某“师傅”却效法其主子，把黑手伸进民兵队伍，搞“第二武装”，叫嚷：“民兵指挥部”不仅要执法，还要管法、立法。他们撇开市人武部、公安局和人民法院搞了户籍管理、侦察破案、审讯定案，妄图用“第二武装”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疯狂镇压人民群众。他们一帮目无法纪，任意抓人、关人、抄家、拷打，大搞法西斯审讯，并私设土牢、禁闭室，施以各种酷刑，其中关人的“木笼子”、“铁笼子”等刑具有二十六种之多。造船厂一个共产党员就因贴了揭发某“师傅”的大字报，被关押了近三个月，打得遍体鳞伤，逃出去后被抓回来打得更重。他们一帮为了不留罪证，还强迫他把血衣洗掉。有个公社的一个革委会委员因曾调查过某“师傅”同伙的一个亲信的罪行，而被抓进“学习班”。他们一帮毒打他，并强迫他吃砖头碴，使他满口流血，满嘴牙齿都松动了。被他们严密控制的工厂等基层单位，也私设班房，任意抓人、关人，多少人被打成重伤，有的甚至成为终身残废。他们还叫嚷：“有些人习惯在鞭子下生活。”这完全是法西斯的腔调。

所谓“某师傅路线”，就是大搞唯我主义的实用主义，妄图用阴谋手段达到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某“师傅”和其主子“四人帮”一样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天在那里自我标榜，“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对他们来说，“有用即真理”，什么历史事实、现实状况、客观规律，都可以任其摆弄，一切服从其篡党夺权的需要。某“师傅”的一个帮兄弟不就说过吗？“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有百分之三十的把握就要干到底”。他们正是从这种唯我主义的实用主义出发，大搞阴谋勾当。

某“师傅”的“发迹”是靠干阴谋勾当，某“师傅”坐山为王霸苏州也是靠干阴谋勾当，某“师傅”联络八方闹南京，更是干了大量的阴谋勾当。他在苏州就网罗了一些“包打听”式的人物，经营了一个网大线长的情报活动网，专搞阴谋诡计。他们或窃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或私整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或“侦察”省委负责同志的住地，或偷拍省委的绝密文件，或私查人事档案，或跟踪、盯梢、监视反对他们的人。有时，干部群众向省委和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一帮的罪恶，他们就不择手段地把信弄到手。有的人民来信落到他们手中，他们便用翻拍机拍下来，作“反革命案件”查处。一度搞得人人自危。

某“师傅”还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某医院建立一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地下指挥所。在那里，他开设专门房间，使用专用电话，并“可以自由活动”，“医院无权干涉”。于是，他又是与上海余党频繁联系，领取黑旨意，传送黑材料，又是召集苏州的帮兄弟密谋策划；又是接待去朝见的帮派头目，向他们面授机宜。各种阴谋诡计不断地从这里炮

制出来。他们不惜采用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恐吓诈骗、劫持绑架、写黑信、告黑状等一切卑鄙手段，今天制造一个“事件”，明天挑起一个“争端”，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揪那个，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然而，他们虽然逞凶于一时，但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所搞的一个个阴谋诡计，都已成了一桩桩乱省篡权的罪证。他们大搞唯我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结果，使自己极端孤立，人心丧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黑线通在黑根上

所谓“某师傅路线”，其实，并非某“师傅”的发明创造，这条黑线还是通在“四人帮”的黑根上，它是“四人帮”极右路线伸向江苏的一条支线。十年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后，“四人帮”在苏州的那支别动队，为了推行“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撰写了一篇篇毒汁四溅的黑文，提出了一条条耸人听闻的口号，玩弄了一个个祸国殃民的阴谋，一时间，花样百出，光怪陆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宗”，就是“三搞一篡”，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狗头军师张春桥和大流氓王洪文窜来苏州，这个某“师傅”先是在一处递纸条求见，后来又赶往某饭店朝拜，事后，他对人说：“他们是大官，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想起来印象很深刻”。从此以后，他就削尖脑袋，拚命投靠“四人帮”，深得其主子的青睐。一有机会，“四人帮”就替他撑腰打气，提高他的身价，说什么苏州市要“由某师傅掌权”，还力图把他塞进省委班子，以改变所谓“力量对比”。某师傅则感激涕零，对“四人帮”无耻吹捧，百般美化，肉麻地说：王洪文“年轻”、“有能力”，“他可以为我们讲话，他是代表我们利益的”，还说什么“我估计张春桥当总理”，等等。就这样，某“师傅”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同“四人帮”紧紧地勾在一起，连他的命运也和“四人帮”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四人帮”反对的，某“师傅”就拚命反对；“四人帮”拥护的，某“师傅”就竭力拥护；他拚上老命，频频为“四人帮”提供打省委负责同志的“黑炮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犬马之劳。只要是“四人帮”的黑旨意，他都紧跟照办，亦步亦趋，即使是一句黑话，他也心领神会，铭刻在心，忠实奉行。铁样事实证明，某“师傅”就是“四人帮”在江苏、苏州的忠实代理人；某“师傅”及其帮兄弟们就是从属于“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一支别动队；“某师傅路线”就是“四人帮”极右路线在江苏的具体实施。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治路线都是阶级的路线，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四人帮”是一小撮极右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的那条极右路线，必然是代表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利益和愿望的。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入人心，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要推行他们那条极右路线，就要乔装打扮，贴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签，打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并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而加以“合法”化，这样，它不仅具有极大的反动性，而且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是，毒草岂能冒充香花，巧妙的伪装终久掩盖不住狐狸的尾巴。他们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根本颠倒敌我关系，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他们那条极右路线，早已遭到广大革命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坚决抵制，只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才为之拍手叫好。当某“师傅”在苏州称王称霸的时候，广大革命人民就怒斥说：什么“某师傅路线”，明明是杀人线，祸国线，复辟线！苏州市郊区一位贫农社员控诉说：“那时我们尝到了吃二遍苦的滋味！”也就在那时，徐州市一个

关押在狱的反革命分子却受到某“师傅”的关怀，而感恩戴德，他在一封黑信中写道：“我激动地抓住铁窗向南方凝望”，“寄无限希望于苏州”，“多么希望再次从某师傅那里获得援助和力量”。“某师傅路线”究竟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某“师傅”坏事干尽，罪恶累累，弄得民怨沸腾，而他却在那里大做皇帝梦，说什么“做了两年皇帝头发都白了！”他和江青大做皇帝梦想当女皇一样，也一心想当江苏的土皇帝。然而，就在他们皇梦未醒的时候，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帮丑类连同他们的极右路线一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某师傅路线”也跟着破产了，某“师傅”其人也现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原形，受到人民的审判，这真是：鬼域伎俩枉自多，恶贯满盈终难逃。

（原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新华日报》）

是谁家的助手

施兆祥

——批判原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追随“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横行霸道、加紧篡党夺权的日子里，有一个身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的人，为什么那样丧心病狂地诋毁敬爱的周总理，公然放肆地攻击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为什么那样百般仇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心积虑要把各级党委负责同志打成“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个人为什么一听到“雨花台”、“长征”等染有革命烈士鲜血的词汇，就暴跳如雷？为什么一看到“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血战到底”、“不许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战斗标语，便坐立不安？

这个人为什么对共产党的省委离心离德，阳奉阴违，动辄“要批判”，处处“对着干”？为什么对社会上的帮派头目倒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当时，人们根据他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就已看出：他根本不象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省委书记！果然，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大打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窃据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的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恶毒攻击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领导人，无耻吹捧“四人帮”，十分起劲地为“四人帮”卖命效劳。他是“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搞反革命活动的一员黑干将，是南京、苏州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一个草头王。他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团委书记，分明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帮派的“帮委书记”！

结帮营私 猖狂反对党的领导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应该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这个黑干将却把共青团内他所窃据的单位变成反党的工具、党的对手，跟着“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的指挥棒转。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接见共青团“三大”全体代表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共青团

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为我国青年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给我国青年最亲切的关怀和教导。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共青团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作为党的有力助手，共青团应当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党的中心工作，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可是，这个团省委书记竟敢篡改团的性质，丢掉了团的工作原则。这个人，尽管党教育了他，培养了他，但他极端仇视党，猖狂反对党的领导，妄图把共青团的工作引到邪路上去，自觉地充当“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代理人的反党凶手。

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就和苏州那个臭名昭著的“某师傅”勾结一起，出卖灵魂，投靠了“四人帮”，上了贼船。从此，“四人帮”吹什么号，他就唱什么调；“四人帮”怎么指挥，他就怎么蹦跳。去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指使其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这个人就当他们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穿梭奔走于“四人帮”在我省的两个代理人之间，既汇报又领旨，效尽了犬马之劳。去年二月开始，“四人帮”先后向江苏派来了两批“记者”，窜到一些单位大搞特务活动。这个人与“记者”多次密谈，了解“四人帮”的意图，提供攻击省委的黑材料，并且煽动、策划其他帮派头目向“记者”告黑状，送黑材料。去年三月初，“四人帮”的代理人叫他离开学大寨工作队，留在南京跟省委斗，他立即摩拳擦掌，领旨遵命，擅自离开六合县溜回南京，进行“三搞一篡”活动。三月底，他多次溜到街头，唆使人鬼鬼祟祟地收集、抄录、整理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批判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反动喉舌的大字报、大标语，然后窜到“记者”那里汇报，要“记者”连夜向“四人帮”报告。这还嫌不够，他又和“四人帮”在省里那个代理人密谋，带着材料，专程赶到上海，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向“四人帮”打黑报告。在五月份，他直接写了一封长信，罗织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向“四人帮”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黑状。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同“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紧密配合，拙劣地表演了一出围攻省委负责同志的双簧。

他利用自己在团省委的合法身分，非法活动于南京的各个帮派之中，把黑手伸向全省七个地、市。他为苏州的帮派兄弟出谋划策，要他们抓住所谓苏州问题，大做文章，大乱江苏，大闹省委。他说：“不能让他们（省委）解决苏州问题，要拖住他们。”他煽动苏州帮派一批一批到南京散发反动材料，造谣惑众，制造事端。对苏州每次来南京的带队人员，他都要事先亲自接见，面授机宜，事后听取汇报，撑腰打气。苏州的那个“某师傅”对他说过：“你还是留在南京，在那里发挥作用大。”他作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篡党夺权的“助手”，确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成了他们的心腹参谋长，高级联络员，前线指挥官。他紧密配合了“四人帮”“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代理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大搞罪恶活动。

如果说，这个团省委书记对于共青团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这些话是根本听不进去的，那末，他对于“四人帮”所鼓吹的以帮代党那一套歪理，倒是蛮能融会贯通、身体力行的。因此，他脑子整天考虑的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共青团怎么办”呀！等等，什么党的领导，在他看来，可以全然不顾。

欺骗青年 组织反革命别动队

共青团应该成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组织和领导青年积极参加三大革命

运动，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这个黑干将却妄图把共青团变成“四人帮”“三搞一篡”的工具，引诱青年走张铁生、翁森鹤道路，培养反革命的别动队，

去年，这个黑干将盗用团省委的合法名义，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你看他，又是办“讲座”，又是开训练班，又是编学习材料，又是出“团的情况”，又是印发《青年工作通讯》，又是搞什么座谈《纪要》，又是策划“谭卫众”大字报，又是组织什么“经验介绍”。仅从去年四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他利用团的名义召开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就有二十次之多。所有这些活动，都贯串一个反动思想，就是为了搞乱人心，煽动团员、青年跟“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跑；都有其理论基础，就是贩卖“四人帮”的钢铁工厂、帽子工厂的货色，灌输“四人帮”那一套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的破烂；都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就是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篡党夺权。所有这些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彻底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哪里还谈得上把共青团办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

看看他四、五月份举办的所谓三次专题“讲座”吧。第一讲，讲所谓南京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别有用心地把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等同起来，胡说要揪什么中国的纳吉，公然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邓小平同志，指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一讲的路子和要求都是这个黑干将亲自定的。讲过之后，他又亲自修改了讲稿，打印后发到全省高校团的组织，并要求他们也照此进行宣讲。第二讲，他特地邀请南京某帮派的一个小文痞放毒。小文痞学着“四人帮”主子的腔调，大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舆论，胡说什么“干部中要是有百分之几的走资派，全国走资派就有几百万人，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大肆诬蔑省委负责同志，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当听众对他的放毒强烈不满时，这个黑干将却充分肯定他放毒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第三讲，是一份书面讲稿，讲的是纪念“五四”青年节，实际上是歪曲“五四”青年的光荣传统，煽动广大青年把矛头指向省委，起来造共产党的反。这样的反动讲稿，也被他视为珍宝，打印后广为散发。这个黑干将在决定举办专题“讲座”时曾说：“把团员、青年思想统起来，发挥我们的作用。”可见，他是要通过这些讲座，妄图毒害广大青年，把团员、青年的思想“统”到“四人帮”那里去，为他们篡党夺权发挥重大作用。

看看他去年六、七月份炮制的“谭卫众”的五张大字报吧。有的大字报抓住“转弯子”问题大做文章，诬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有的大字报煽动群众把追查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引向省委和南京市委负责人。有的大字报把“四人帮”攻击、诬蔑省委负责同志的恶言毒语公布于众。有的大字报转抄所谓省委后院起火的大字报，狂叫那份大字报“行动好得很”，“坚决支持”！“谭卫众”抛出的这些反革命大字报，都是由这个黑干将亲自策划、授意、修改、定稿后出笼的，其目的是为了把群众思想搞乱，把省委的部署打乱。

再看看他召开的各种形式的会议吧。无论是五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的全省团的工作会议，还是五月下旬在苏州召开的全省高校团委书记会议，无论是六月初南京部分工厂团干部会议，还是七月下旬全省部分团干部座谈会，都是经过他和“四人帮”在省里的代理人策划的，有些会议的出席单位和人员都是由他圈定的；会议的发言，会议的经验介绍，会议的“纪要”，会议的总结，都是经过他审定的。这个会，那个会，都是造谣会，他带头攻击、诬蔑省委和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都是煽动会，他公然动员各级团的组织和各级党委“对着干”。几十个人的大会是这样，几个人的小会也是这样。用他的话说：“小会也能做大文章”。就是说，小型会议也能做反党的太文章，小型会议也能干搞乱党的的大动作。总之，他千方百计地要

这些会议的矛头，引到针对省委及各级党委的邪路上来，以达他们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身为一个团省委书记，他既不让团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要团员青年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当团省委有关部门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时，他毫无兴趣，蓄意刁难。他极力反对培养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大力支持那些不学习、不上班、不生产的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培植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翁森鹤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结帮拉派 大搞篡党夺权勾当

共青团应该把青年团结、组织起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这个黑干将却利用团组织在团内团外组织帮派势力，指挥帮派向党猖狂进攻，为复辟资本主义卖命。

在团省委机关内，他盗用群众名义，树起了一个以他为头子的“谭卫众”帮派。“谭卫众”其名并不副实，团省委机关里跟他勾结在一起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同志对他搞的那一套很反感，是有抵制、有斗争的。他对机关同志，采取能拉就拉、拉不动就压、压不服就打的恶劣手段。凡是反对他的同志，这个黑干将就不断地造舆论，说他们“没有路线斗争觉悟”，“受正统观念影响”，“思想保守”，甚至造谣诬蔑，贬低丑化他们，在工作中千方百计抓小辫子压他们，刁难他们。凡是跟他走的人，则兄弟相称，百般信任，另眼相看，委以重任。

这个黑干将还把黑手伸到全省各地，纠集大大小小的帮派起来作乱。从去年初到“四人帮”垮台为止，他以自己的家和团省委机关作为联络点，串连的帮派头目遍及三个地区、五个省直辖市和省级机关中的二十多个单位。南京、徐州有几个名声很臭而野心很大的帮派头目，过去在某些方面同他不大投合，去年也都主动向他靠拢，希望消除所谓“历史性的误会”，扭在一起斗省委。他野心勃勃地说：“我要把南京各路人马联合起来，把他们团成一股力量。”因此，南京地区就成为他进行结帮串连活动的重点。经过他的多次密谋策划，南京的“尚九天”、“夏五洋”、“凌云志”、“伍灿哲”等七个反革命帮派组织，很快就勾结到一起，麇集到他门下，并在一些反对省委、市委的活动中实现了“统一行动”。他把黑手伸到南京的一些重要工厂和大专院校，认为这些单位在南京和全省的影响大，这些单位乱起来，容易打乱省、市委的部署。他还在省级机关拉帮结派，策动作乱，妄图在省委后院“纵火”，从内部夺取权力。混入省委办公室的两个家伙抛出的那份所谓后院起火的反革命大字报，就是他和“四人帮”在省里的那个代理人参与策划并亲自修改后出笼的。他除了直接操纵南京、苏州的帮派外，还指挥无锡市、徐州市、太仓县、溧水县等地的帮派头目，或是替他们出谋划策，或是为他们撑腰打气，或是指示他们招兵买马，或是布置他们收集黑材料。他真无愧于“帮委书记”的称号了！但是，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全省广大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对以这个黑干将为代表的——一小撮败类，早就把他们视作臭狗屎了。

逆革命潮流而动的人，决不会有好结果。这个窃踞团省委书记的人，野心很大，闹得很凶，名声很臭，当初不可一世、嚣张之极，如今已经随同“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陷入了千百万群众和广大团员、青年革命大批判的怒涛之中。

（原载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新华日报》）

“女掌柜”是怎样乱省篡权的？

——揭批“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的一个同伙

汪永珠

沈 吉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舞台上，“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我省苏州市就有一个所谓“能干”的女将，多年以来，标榜自己是“反潮流的勇士”，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女干部”，装成是正派人物的样子。但是，只要拿掉她的假面，戳穿她的谎言，就显露出她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派角色。她表面上是苏州市委的一个副书记，骨子里却是“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某师傅控制的帮派小集团的核心成员。她在帮派中排行“老二”，人们称她是掌管里里外外的“女掌柜”。在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三搞一篡”的罪恶活动中，她秉承“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黑旨意，乱省篡权，上窜下跳，泼辣奸诈，捣鬼有术，演出了一幕幕反革命丑剧。

乱省篡权 凶狠毒辣

对这个“女掌柜”来说，“权”是她的命根子，是系在她脖子上的一块“通灵宝玉”。她和帮头帮兄帮弟们靠这个安身立命，靠这个横行一时，也为了这个去为非作歹，拚着性命干。她鼓动同伙们：“要胜利一起胜利，要完蛋一起完蛋。”真是一副亡命之徒的“吃相”。说起权，她和她的同伙们早有了，而且很大。在几年之内，这些人投机发迹。那个某师傅已实际上独揽苏州大权，“女掌柜”也窃据了市领导人的高位。但是，他们贪婪成性，权欲难填，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攫为己有。他们的这种胡作非为，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人民的抵制。对于这，她和她的同伙是不甘心的，正象那些失去了自己“天堂”的剥削阶级那样，“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把刀刃指向省委，指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妄图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篡夺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这股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正合“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需要。因此，一九七六年的“以苏乱苏”的反革命丑剧，就在“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的代理人上下勾结、精心策划之下导演出来了。“女掌柜”在这场反革命丑剧中扮演了二号角色，使尽了全身解数，表演得淋漓尽致。

且看她是怎样表演的：

平常日子，你莫看“女掌柜”表面上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但是，当她要把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什么“吹鼓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南京事件“幕后策划人”的那股凶狠毒辣劲儿，实在令人作呕。她撒泼的场合，总是挑选党的重要会议，伙同一些人发难起哄。大会大闹，小会小闹，胡缠蛮搞，偌大的会场，往往只听到她哇哇乱吵的噪音，喷射出大量污言秽语。一九七六年四月，省委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她以敦促转弯子为名，指名道姓地要省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脱裤子，割尾巴”，当众要挟；同年六月，在省委八个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她气势汹汹地指着省委另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责问：“南京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

为何老是查不出来，你这个省委书记该当何罪！”这个“女掌柜”不仅在会内泼妇骂街，会外还组织恶棍、文痞火力助威。这伙人精工炮制黑文，抄成大字报张贴通衢街头，煽风点火；印成传单散发会场代表，谬种流传。什么“敦促转弯子公开信”，什么“评某某讲话”，什么“一本反攻倒算的变天帐”，等等，把省委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说成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把省委调整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说成是“走资派在复辟资本主义”。棍子乱舞，帽子乱飞。在这个“女掌柜”嘴里，省委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全省五千多万人民的革命事业则是漆黑一团。

“女掌柜”在南京缠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凶神恶煞似地闹；在苏州市里，则是“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她借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为名，千方百计想扩大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大辩论、大混乱。理论讨论会、各种纪念会，她要搞成什么对“走资派”的控诉会。总之，即使是抓住一根稻草，她也要大做文章，借机把水搞浑，造出各种古怪问题。这里单说一件事。根据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报告的精神，苏州市组织工作队下郊区，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对这样一件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措施，她却伙同帮派狗头军师大肆造谣，蛊惑人心。说什么“组织工作队是排挤打击新生力量”，“留机关的是先整后下，到工作队的是先下后整”。你置之不理，她就说“不吭声就是默认”；你郑重辟谣，她就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工作队进驻郊区搞整风，被诬蔑为“矛头向下，整基层干部”；批资本主义邪气，被歪曲是“大走资派抓小走资派”。反正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当工作队春节回城集训，她同某师傅披着市委领导人的“合法”外衣，大搞非法活动。两人并肩到了集训驻地，跑遍了每个小组，握遍了每个队员的手，脸带三分笑，口喊“辛苦了”，“慰勉有加”。其实是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那些帮派骨干乘机倾巢而出，大搞反革命串连，围攻省、市委的大字报顷刻之间就铺天盖地而来。三天的集训，弄成三十天，还收不了场。好端端的一个几百人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伍，最终被他们搞垮了事。这个阴险狡猾的“女掌柜”及其一伙玩弄的毒辣一手，目的很清楚，就是张春桥所散布的反革命谬论：“反动路线把工作队赶下去，不让人家回机关造反行吗？”

“女掌柜”及其一伙对“四人帮”的黑话，从来是奉为“圣旨”，紧跟照干的。那一段的闹腾日子里，“四人帮”不断传话：“江苏陷得不浅”、“某师傅又在放炮了”。因此，黑文接连出笼，诬告信雪片飞去。一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急催快搞一份关于江苏省委的“材料”，“女掌柜”自告奋勇，专程奔赴南京收集素材。那几天里，你看她奔波得好忙哪：一刻儿同“四人帮”在省委里的代理人密谈，一刻儿与某师傅安插在团省委的心腹相叙；白天，要接待南京、常州、徐州、镇江等地的帮派头目；晚上，还要到“后院起火”大字报炮制者的家里串连。那帮人提供的谎言诽谤，塞满“女掌柜”的荷包。某师傅视若至宝，彻夜开会商量，臭谋士摇唇鼓舌，黑秀才舞文弄墨，“女掌柜”提笔修改，黑材料炮制成一万二千字的诬告信，另加附件七个。洋洋数万言，你道是些什么货色？他们把《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悼念文章，污蔑为“反动气焰嚣张”，“是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的准备”。把省、市委以及几十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攻击为“幕后策划人”、“破坏彻查的罪魁祸首”。诬告信一送走，“女掌柜”和那些帮头头欣喜若狂，认为打倒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是已经胜利在握，将由他们去收拾“残局”，登堂挂帅了，得意地说：“这下子抓到要害，是一颗重磅炸弹”。且慢，要说“重磅炸弹”，确实是一个“重磅炸弹”。但是是一个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反对敬爱的周总理、乱省篡权的反革命罪行和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的重磅炸弹。

倚仗靠山 有恃无恐

这个“女掌柜”如此毒辣凶狠，又如此有恃无恐，她究竟倚仗的什么势力？

“我们有靠山”。靠山就是“四人帮”。话得从某师傅身上说起。某师傅早就对“四人帮”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特别是他在王洪文主持的什么学习班镀金以后，更是念念不忘：“他可以为我们的讲话，他代表我们的利益。”这里所说的他，就是王洪文；这里所说的“利益”，就是篡党夺权；这里所说的“我们”，就包括“女掌柜”在内。自从“四人帮”余党安排某师傅在上海一家医院养病后，那里就成为“四人帮”同某师傅的联络点，密谋搞乱江苏、搞垮省委的指挥所。此后，“女掌柜”就仆仆风尘，往来于上海、苏州之间，接受黑旨，上递黑状。“四人帮”余党们频频传话：“某师傅受压了”，“这次运动总要解决一些问题吧”。既是慰勉，又是煽动。“女掌柜”抓住良机，窜到上海，电求王洪文秘书，要求“首长”接见，说什么“要让王洪文把我的名字和我本人对起号来，加深印象。”迫切之情，溢于言表。对号虽未成功，印象确已加深。一次，王洪文凶横地斥责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江苏问题不少，告你们状的不少，我看都看不过来。”现在十分清楚，王洪文的黑话，其来源之一就出于“女掌柜”、某师傅等人罗织罪名的诬告信。当时，王洪文的黑话传来苏州，“女掌柜”手舞足蹈，好不得意，更加肆无忌惮地吼叫：“王洪文就是我们的靠山。”她就是借助了“四人帮”的黑神，用作制人的法宝，壮胆的图腾。

“四人帮”在省委里的那个代理人，则是“女掌柜”在江苏的一根大支柱。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女掌柜”建立帮派“世业”中，需要这样显赫的权势人物；那个代理人觊觎省里第一把手的位子，也需要招揽各路帮派人马，以壮声势。共同的政治目的，共同的利益需求，促使他们结成异乎寻常的“同盟”。那个代理人对“女掌柜”唱尽了赞美歌：她“年轻聪敏”，是“全省女干部中较好的”；她“受压”，但是“敢于斗争”。他要推举“女掌柜”任省委常委，和他“并肩战斗”，因而一而再地逼省委常委会讨论，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女掌柜”对代理人的“知遇之恩”也就尽力报效，说那个代理人是“有战功的老干部”，“有反潮流精神的常委”，“他是我们的人”。这里，前面两句完全是无耻的吹捧，后面一句倒是说得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省里举行重要会议，代理人就把内情向“女掌柜”通风报信；“四人帮”在北京有什么黑话，代理人立即向“女掌柜”路线交底；苏州帮派小集团有什么动作，代理人就为“女掌柜”指点引路。在去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紧锣密鼓声中，“女掌柜”窜到代理人家里，又是共进丰美午餐，又是相赠人参茶叶。在这幅热闹场景下，进行了密室交谈，代理人说什么：“追查南京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是件大事，这个事不解决，其它事都不好办。”“追查搞了小鱼小虾，阻力大，省委内部斗争很激烈。”“我从北京回来，就抓住这事不放。”代理人说得隐晦含蓄，“女掌柜”听得心领神会，就是要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幕后策划人”，紧紧抓住这件“大事”不放。苏州帮派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听了“女掌柜”传来的情报，那个反党恶棍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一下，某、某两人就完蛋了。”他们更是放胆大干，联络八方调兵马，破釜沉舟闹省委。去年六、七、八三个月，在南京刮起的阵阵妖风，其风源之一岂不就在这里吗？！

至于“女掌柜”的直接后台是“四人帮”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某师傅，这是众人皆知的事了。早年，当这股力量崛起于苏州时，他俩是同时发迹的。在“四人帮”的扶植支持下，某师傅结成了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的一个帮派，坐山为王，“女掌柜”就成为这个帮派

“老头子”的得力副手。她是在一人之下，帮兄帮弟之上，高踞管家宝座。在乱省篡权活动中，“女掌柜”出谋划策，某师傅言听计从；某师傅发号施令，“女掌柜”亦步亦趋。当某师傅外出养病，“女掌柜”就坐镇苏州指挥。她的威势，在帮内引起狗咬狗的权位之争。那个反党恶棍扬言要咬下这位“九天玄女娘娘的脚趾头”。某师傅不得不出来卫护，说：“就是她一个人，我也要保”。去年，“女掌柜”有机会参加出国访问团，某师傅连声反对：“她走了，苏州的家怎么办？”这个家就是他们的帮派小集团。“女掌柜”也借辞推托，说：“我走了，某师傅孤掌难鸣”。由此可见，“女掌柜”同某师傅在结帮营私、结帮篡党中相依之深。

以上可以看出，“女掌柜”那股有恃无恐的凶狠毒辣劲儿，就是来自“四人帮”及其在江苏、苏州市的代理人。

帮内持家 大搞“双突”

林彪把苏州当作半个家。无独有偶，那个“四人帮”的代理人某师傅，更把苏州当作自己的家天下。全市的党政大权，被他视作帮派私产。已经到手的，抓住不放；还未到手的，明争暗抢。攫取组织、人事大权更是他乱省篡权重要的一着棋。批林批孔后，某师傅乘机动手，以市委常委分工为幌子，委托“女掌柜”分管组织工作，独揽全市组织大权。

“女掌柜”全力以赴贯彻“四人帮”和某师傅的意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和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作资本，当商品，收买亲信，网罗党羽，拼凑班底。给那些卖命的帮兄帮弟，赠“党票”，封高“官”，授重权，大演“封神榜”，一时间被弄得个乌烟瘴气。

“唯才是举”是他们的口号，公然与毛主席“任人唯贤”的五项条件相对抗。他们说的“才”，就是黑三条：“有感情”、“能冲打”、“有势力”。所谓“有感情”，就是同他们臭味相投，阿谀奉承，死心塌地搞修正主义；所谓“能冲打”，就是那伙“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有打砸抢本领，愿为乱省篡权卖命；所谓“有势力”，就是能拉帮派、带队伍，手头有伙喽罗走卒。按照这个标准，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帮兄弟们，拉进党内，放上领导岗位，在党政权力机构内部结成帮势，打着合法的旗号，干着非法的勾当。他们出则有人抬轿子吹喇叭，入则有人密谋献策；攻可蜂拥而起，退可互相掩护，畅通无阻地推行“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把苏州市闹腾成为他们的“帮天下”，一个反革命的独立王国。以此为基地，配合“四人帮”，闹乱全省，闹乱全国，篡党夺权。这就是“女掌柜”说的“造反派就是要坐天下”。好一副如意算盘。

“中焦阻塞”，这是他们搞“双突”的借口。“阻塞”在那里，就是“某师傅路线”（“四人帮”极右路线在苏州的一条支脉）贯不下去，遭到革命同志，首先是中层干部的抵制和反对。这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女掌柜”狂叫，什么区局机构患了“食道癌”，“中焦阻塞”，“上下不通”，大骂省、市组织部门是“复辟部”、“刽子手”叫嚷着“要改组”。一九七五年三月，某师傅从北京回来，秉承了“四人帮”的“不要放过时机”，“领导班子要动”，“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的黑旨意，大动杀机。他交代“女掌柜”，首先大抓区局以上领导班子，“要抓紧时间，一批一批地搞，分几批搞完”。于是，“女掌柜”就大动手术，大搞“双突”了。从当年四月到八月，短短几个月时间，仅在二十多个区局单位就“提拔”区局一级领导干部近百名。时间之短，变动之大，数量之多，这是苏州市组织工

作史上所罕见的。这里姑举几个“活标本”，看看粉墨登场的是些什么东西：那个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一经粉饰，就被任为局头头；那个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的流氓分子，摇身一变，就成为核心组成员；那个横行霸道、打砸成性的新生反革命分子，青云直上，充当掌握他们帮派“第二武装”的指挥。总之，革命的人们认为是沉渣腐草一类的货色，却被“女掌柜”、某师傅视作“鲜花”、“好料”，都要集纳到自己的杏黄旗下。

“帮内提名，强迫党委通过”，是他们搞“双突”的手法。有些“突”进领导班子的“宝货”，名声实在太臭，如果按党规党法办事，他们是通不过的。“女掌柜”就由帮内酝酿提名，或“小兄弟上书劝进”，而后采取突然袭击，强迫党委通过。谁要是说个“不”字，就反诬你“压制新生力量”，要搞所谓“砸开党委大门”，“点名搬去石头”。这里只说一说“上书劝进”一例。“女掌柜”和某师傅为了要把那些“前台打手”、“赤脚司令”塞进市委常委班子，朝思暮想，费尽了心机。他们大嚷“权的问题上不要避嫌”，“果园的桃子就是要摘”。在一段时间里搞了不少小动作，挖空心思地授意一伙帮兄弟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上书劝进，要挟市委常委向上报批。这些人得意忘形了，在市委常委和全市区局干部面前，一个反党恶棍杀气腾腾叫喊：“你们不干就给我滚，我来干！”以帮压党，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滚”，这是“女掌柜”为了推行“双突”用以对付老干部的恶劣手段。在她心目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有罪，同帮派保持距离的也有罪，要统统打倒，打不倒也得靠边站，由他们取而代之。一个老干部有病，她胁迫人家自动退休，要“滚”回家去；另一个老干部从苏北调来，她说是“开后门”来的，要“滚”回原地。今天骂这个是“还乡团员”，明天骂那个是“儒家当道”。凡是她不顺眼的，挡她道的，统统就得“滚”，让位给她的帮兄弟、帮姐妹。

在这个“女掌柜”的经营下，一批帮派成员钻进党政机构，进一步篡夺了苏州市党政的一部分权力。可是，这个“女掌柜”在检讨中却怀着委屈情绪说：她的罪行，都是“被这些活鬼迷住了心窍”干出来的。这是欺世谎言，迷了她心窍的东西，不是“活鬼”，而是以帮篡党的“野心”。

本性难移 品质恶劣

这个“女掌柜”干了这么许多坏事、丑事，可是她却把自己说得美得很，什么“工人家庭出身”，“革命运动推上来的”等等。纯得很哪！再一查，不对了。此人是颇有一些来历的。

她父亲是个集镇上开茶馆、摆赌台的地痞，在反动的一贯道黑榜上有名，是个坛主，同旧社会三教九流人物是常来又常往。这个家庭的环境和思想体系给予她多年的熏染，使她留下极其深刻的阶级烙印。

残忍狠毒，报复性重，是此人的本性。凡是顺着她的，无官的可得乌纱帽，非党的发给党票，谁要是触犯了她，弹指之间就被“合法”地虐杀，弄得几乎不得超生。苏州晶体元件厂的干部、工人就受到这种遭遇。那个厂的同志无非是抵制某师傅的帮派活动，“女掌柜”就顿生杀机，借口开进调查组。其实，调查组并不调查，而是以人划线，以帮站队，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被摧残得几度自尽，有的被投进班房关押。用她的话来说，这是“分清路线是非”。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女掌柜”

是一不做、二不休的，随后采取“搬石头”的组织措施，对一些人实行“散、远、重”三字方针。散，就是把这路人打散，许多我国第一代宝石加工专业人员，被打散得七零八落；远，家在城东调城西，家在城南去城北；重，分配干重活、粗活。“女掌柜”对这些无辜的人们大施淫威，还美其名曰：“照顾困难”。此人的残忍狠毒，由此可见了。

以屈求伸，韬晦之术，此人也学到了几分。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种人“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不过她不是装“死”，而是装“病”。批林批孔运动中，革命群众追查某师傅同林彪的黑关系，这使帮派群魔惶惶不可终日。此人觉得吉凶未卜，就突然发“病”回家休养了。等到主子王洪文出面为某师傅开脱罪责，撑腰打气，她眼看大局已定，“病”情顿时消失，破门而出，参与秋后算账。好景不长，正当此人利令智昏、得意忘形时，全省“一学三批五大讲”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她见势不妙，于是，又断断续续地生起“病”来，并且向省、市委虚情假意地作几句检讨，承认“资产阶级派性在自己身上是存在的”，“自己屈服于派性压力”，“搞了‘双突’”，如此等等，一时度过了一九七五年的“难关”。时隔不久，“四人帮”加快篡权步伐，掀起腥风恶浪，此人自认吃准风向，她的“百病”又告全患，重挥屠刀上阵，向党向无产阶级猛扑过来。她对过去的“检讨”翻脸不认账，倒打一耙，质问省委说：“说我们派性掌权，有什么事实根据呢？”“给戴上‘双突’帽子，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成果！”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女掌柜”运用以屈求伸、韬晦之术，是何等巧妙！

表面说一套，背后干一套，是此人固有的两面作风。她明明权欲熏心，野心勃勃，但在大庭广众面前却口口声声说，“我不是要做官”，“还是去做工”。可是，谁要说她在工厂做过“阿姨”，她就恨不得咬下你一块肉。对解放军，她当面假惺惺说几句：“支左贡献卓越”，可转过脸来又恶狠狠地加以辱骂。她高调唱得最响，标榜自己是“巴黎公社式的干部”，大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似乎洁白得很，实际上她的行为并不高雅。半买半拿的红木家具，她也要，反过来斥责他人买廉价品；小病要大养，一次处方就用三十支丙种球蛋白。这那里是“巴黎公社式的干部”，说她是“资产阶级式的新贵”，倒是极为相称的。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思想作风，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个“女掌柜”不仅具有她那个不光采家庭的劣根本性，而且接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腐朽思想的灌输，封资修是一应俱全的。她的灵魂实在是肮脏透了。

这种货色的“女掌柜”及其资产阶级帮派集团，竟想把无产阶级的事业一口吞下肚去，搞篡党，谋夺权，难道广大革命同志能答应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主义在不断胜利前进，人民的江山是撼动不动的，这个“能干”的反派演员只能以帮败名裂而终场。

（原载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新华日报》）

更正：《大批判材料》第10期第2页第11行“引进师”应为“坛主”。特此更正。